

中 | 华 | 经 | 典 | 名 | 著
全本全注全译丛书

周 礼

徐正英 常佩雨 译注

【上】



中華書局

中华
经典
名著

全本全注全译丛书

徐正英 常佩雨◎译注

周礼 上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周礼/徐正英,常佩雨译注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4.2
(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)

ISBN 978 - 7 - 101 - 09807 - 5

I. 周… II. ①徐…②常… III. ①礼仪 - 中国 - 周代②官制 - 中国 - 周代③《周礼》 - 注释④《周礼》 - 译文 IV. K224.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65645 号

书 名 周 礼(全二册)
译 注 者 徐正英 常佩雨
丛 书 名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
责任编辑 王水涣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4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
2014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印张 34½ 字数 560 千字
印 数 1 - 8000 册
国际书号 ISBN 978 - 7 - 101 - 09807 - 5
定 价 76.00 元



前言

《周礼》，亦称《周官》、《周官经》、《周官礼》，是现存儒家十三经中的一部经典，我国第一部系统、完整叙述国家机构设置、职能分工的专书。它涉及古代官制、军制、田制、税制、礼制等国家重要政治制度，为我国秦汉以来历代国家机构建制提供了全面的参照体系，可谓研究上古文明的百科全书，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文化史上影响深远。

一、《周礼》的发现、书名及篇数

在儒学经典中，《周礼》是最晚出的一种，该书仅有古文，没有今文。

据《汉书·景十三王传》记载：“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，《周官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老子》之属，皆经传说记，七十子之徒所论。”则《周官》是西汉初期景武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献书中收集所得，藏于汉官秘府中，长期未曾公之于世。

《史记·封禅书》载，武帝与公卿诸生议封禅，“群儒采封禅《尚书》、《周官》、《王制》之望祀射牛事”，贾公彦《周礼疏序》则称“《周官》，孝武之时始出，秘而不传。《周礼》后出者，以其始皇特恶之故也”。据此，则明确论及《周礼》出于武帝时。史载西汉末成帝时，刘向、刘歆父子校理秘书，发现此书，先后著录于《别录》、《七略》，《周礼》至此正式公开。

《周礼》现世后，先后出现多个名称。初现时，称为《周官》，这是今存史籍对该书最早的称谓。哀平之世，刘歆作《七略》，名之为《周官经》。王莽居摄（公元6年）之后，刘歆为国师，认为该书是“周公致太平之迹”，故更《周官经》为《周礼》，立为官学，成为官方承认的经典。

东汉时期，《周官》、《周礼》二名并用，至汉末郑玄作注，取用《周礼》之名，其《仪礼》注文、《礼记》注文等，亦均称《周礼》。由于郑玄《周礼注》被视为经典，从而使《周礼》之称进一步巩固。

魏晋时，《周官》之称仍时与《周礼》之名并存。南北朝时，有学者综合二名，将其称为《周官礼》。

唐高宗时，贾公彦据郑玄《周礼注》作《周礼疏》五十卷。文宗开成年间刻成的石经，称为《周礼》。至此，《周礼》之名最终确立。然后代注疏，仍偶见有称《周官》者。

自河间献王晚年将此书献于朝廷之后，百余年间，少人问津。迨刘歆将其著录于《七略》中的《六艺略》时，称“《周官经》六篇”及“《周官传》四篇”，然此六篇《周官经》实为五篇，《冬官》一篇以《考工记》补足。刘歆的弟子杜子春作《周官注》，已对《冬官考工记》作注释。但《汉书·艺文志》对此并无说明，而《周官传》四篇又亡于兵燹，东汉之初已不得见。于是众说纷纭。马融以为《考工记》是刘歆所补，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和《隋书·经籍志》则以为是河间献王所补，孔颖达又认为是汉文帝令博士所补（此说不足信），贾公彦则判定为六国时所补。郑玄《三礼目录》中《冬官考工记第六》下云：“《司空》之篇亡，汉兴，购求千金不得。此前世识其事者，记录以备大数，古《周礼》六篇毕矣。”郑玄之说，较为合理。

二、《周礼》的成书时代与作者

《周礼》面世后，其成书年代和作者问题，就引起了众多学者的激烈争辩，近现代学界依然争论不休，迄无定论。归纳起来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：

1. 西周初年周公手作说

即认为《周礼》是西周周公姬旦亲自撰作。刘歆首创此说。他认定其为“周公致太平之迹，迹具在斯”，即为周公所制官政之法。东汉末年，经学大师郑玄因袭其说，在《周礼·天官·叙官》“惟王建国”之下注曰：

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，谓之《周礼》。营邑于土中。七年，致政成王，以此礼授之，使居雒邑，治天下。

其后一大批学者，如唐代的孔颖达、贾公彦，宋代的王安石、张载、李觏、曾巩、司马光、朱熹，清代的魏源、汪中、惠士奇、江永、孙诒让等也都力主此说。唐贾公彦在《序周礼废兴》中说：“唯有郑玄遍览群经，知《周礼》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，故能答林硕之论难，使《周礼》义得条通。”南宋朱熹明确指出：“《周礼》是周公遗典也。”称之为“盛水不漏”，认为非周公不能作。清末经学大师孙诒让《周礼正义序》曰：“粤昔周公，缵文武之志，光辅成王，宅中作雒，爰述官政，以垂成宪，有周一代之典，炳然大备”；又在《周礼正义略例十二凡》中说：“此经为周代法制所总萃，闳章缙典，经曲毕咳。”

周公作《周礼》说在古代影响最大，信从者最多。但各家均未能提供可靠的证据。此说尚存在疑点，如，《周礼》中官职名称、公田大小与周初的实际情况不合，而且文字风格也与当时实际不符。故周公作《周礼》说当存疑。

2. 作于西周、作者不详说

持此说的主要为现当代学者。如蒙文通在《从社会制度及政治制度论周官成书年代》中认为，《周礼》“虽未必即周公之书，然必为西周主要制度，而非东周以下之治”。日本学者林泰辅的《周官著作时代考》，对《周礼》所见天神、地祇、人鬼，以及伦理思想、政治制度等进行了详细分析，认为《周礼》作于西周末的厉王、宣王、幽王时期。陈汉平在《西周册命制度研究》一书中，就册命金文所见西周官制多与《周官》内容相合

之现象对《周礼》成书年代进行推断,表示其倾向于《周官》成书在西周之说。李学勤《新出青铜器研究》一书将《周礼》与金文对照研究,通过出土金文“裘卫”考证《周礼》“司裘”,指出“司裘官名只见于《周礼》”,其它任何古书都是没有的,他进而认为这充分表明了《周礼》的真实可据,同意《周礼》一书产生于西周的观点,但不认定它一定是周公所作。汤斌、白玉林《周礼概述》认为,仅就根本制度和经济水平来考察,《周礼》的设官分职是以西周前期的社会现实为基础的。朱谦之《周礼的主要思想》说:“此书中所用古体文字,不见于其他古籍,而独与甲骨文金文相同,又其所载官制与《诗经》之‘大雅’、‘小雅’相合,可见非在西周文化发达的时代不能作。”训诂学者洪诚从语法角度探讨《周礼》的成书年代,他在《读〈周礼正义〉》中指出,《周礼》成书当于西周宣王中兴时代,最晚不会晚于东周惠王后。

3. 作于周室东迁之后,平王至惠王之间说

当代有学者认为,《周礼》“成书最晚不在东周惠王后”。金景芳在《周礼》一文中,详细考察《周礼》的语法、封国之制、畿服之制与周制的差异后推论说:“我认为《周礼》一书是东迁以后某氏所作。作者得见西周王室档案,故讲古制极为纤悉具体。但其中也增入了作者自己的设想。例如封国之制、畿服之制一类的东西,就是作者自己设想所制定的方案。这个方案,具有时代特点,不但西周不能为此方案,即春秋战国时人也不会作此方案。原因是春秋战国时,周室衰微已甚,降为二、三等小国,当时不会幻想它会复兴。而在西周的历史条件下,则不可能产生这样的设想。”

王宁等在《评析本白话十三经》中认为:“《周礼》一书是在周王朝东迁以后,即在东周平王至东周惠王之间(公元前770年—公元前676年)产生的,作者极有可能是管理档案材料的官员。书中所反映的周制,当是西周初期尚未改制,也就是沿用殷制时的周制,同时又有不少内容是作者的设想。”该书还指出,《考工记》本是另外一部书。书中云:“秦之

无庐也，非无庐也，夫人而能为庐也。”又云：“郑之刀，宋之斤，鲁之削，吴、粤之剑，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，地气然也。”秦封于周孝王时，郑封于周宣王时，则《考工记》书必在西周孝王和西周宣王以后出现。《南齐书》里记文惠太子萧长懋镇雍州时，有盗发楚王冢，得竹简书，青丝编，凡十余编，以示王僧虔。王僧虔曰：“是蝌蚪书《考工记》。”据此可知，《考工记》也绝非秦朝以后的人所作。

4. 作于春秋说

当代学者刘起钎搜集《周礼》以外的所有职官文献，又采用郭沫若《西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》中的金文官制材料，写出《两周战国职官考》一书。据此研究成果，他在《〈周礼〉真伪之争及其书写成的真实依据》一文中说：“《周礼》一书所有官职资料，都不出春秋时期承自西周的周、鲁、卫、郑四国官制范围。”“所以《周官》一书，最初作为官职之汇编，至迟必成于春秋前期。”王雪萍《〈周礼〉饮食制度研究》认为，《周礼》所叙述的各种制度，主要反映的是西周中后期的典章制度，成书过程中也受春秋时期多种思想观念的影响，由此判断“它成书于春秋时期”。

5. 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，孔子及其弟子为写定者说

谢祥皓、刘宗贤在《中国儒学》中认为，《周礼》是周代典章制度的集结与规划，是周公经国治政的产物，“即使不是周公亲自制定，也必然是在周公的主持或指导之下完成的”。“不论今存《周礼》究竟写于何时，在周公时代必定已经具有了它的雏形。”其结论是：“今存《周礼》乃形成于周公，写定于孔门，传世于刘氏父子。”即《周礼》的最终写定年代当在春秋战国之际，最终写定者可能是孔子及其弟子，刘歆使其在社会上流传开来。唐镜、刘庆华亦认为《周礼》规模宏大，应是周代典章制度的集结与规划。其中既有对夏、殷两代礼制的承袭，又有对周代礼制的改造或新定，更多的则是理想的规划或设想。其写定或当在春秋末到战国时。其书只能是以恢复周礼为己任的孔门弟子所作。而其最后面世，确实经过了刘向、刘歆父子。此说可谓折衷之说。

6. 成书于战国说

此说始于东汉的林孝存(即林硕,或又名临硕,《后汉书·郑玄传》作“临孝存”)和何休。据贾公彦《序周礼废兴》所述,林孝存认为《周礼》是“末世湮乱不验之书”,故作《十论》、《七难》以排弃之。东汉何休认为,《周礼》是“六国阴谋之书”。“末世”、“六国”皆指战国时期。汉儒张禹、包咸,唐朝赵匡、陆淳,宋代刘敞、欧阳修、苏轼,明代季本,清代崔述、皮锡瑞均信从何休说。皮锡瑞指出,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有“六国之君,魏文侯最为好古,孝文帝时得其乐人窦公,献其书,乃《周官·大宗伯》之《大司乐》章也”的记载,由此并根据其他一些记载,认定六国时已有此书。今人郭沫若、范文澜、钱穆、顾颉刚、杨向奎、黄沛荣、金春峰、沈长云、李晶等亦持此说。

此说在具体早晚分期及作者地域等问题上,又有异说。如,沈长云、李晶通过对春秋时期列国官制的清理,并以之与西周官制及《周礼》所记载职官系统仔细比较,发现春秋时期官制无论在整体格局上还是各职官的官称、具体职掌上,都较西周时期更接近于《周礼》,故他们判断《周礼》的成书年代不会早于春秋末叶,或当在战国前期。顾颉刚、杨向奎二位先生把齐国文献《管子》与《周礼》对照,从其什伍组织、授田制度、“足甲兵”的法令与《周礼》所记相似中,断定《周礼》为战国时期齐国人所作。金春峰则认为《周官》是战国晚期、秦统一之前秦地学者的作品。沈长云、金春峰等学者,除注重对文献进行稽考外,还采用了金文、出土秦简等新出土文献材料,这一研究亦具有方法论价值。

按,《周礼》成书于战国说,是目前学术界比较通行的观点。笔者亦赞同《周礼》成书于战国说,而其成书于早期抑或晚期,作者的具体国别,则可作进一步讨论。

7. 成书于秦朝说

南宋魏了翁在《鹤山文钞·师友雅言》中认为,《周礼》为“秦汉间所附会之书”。清代毛奇龄在《经问》卷二中云:“此书系周末秦初儒者所

作。”梁启超在《古书真伪及其年代》中断言：“这书总是战国、秦汉之间，一二人或多数人根据从前短篇讲制度的书，借来发表个人的主张。”陈延庆《周礼成书年代的新探索》认为：“《周礼》制作年代的上限，不早于商鞅变法。……它的下限也不会晚于河间献王在位之时。……《周礼》成书年代的最大可能，是在秦始皇帝之世。”史景成《周礼成书年代考》认为，《周礼》作于《吕氏春秋》以后、秦统一天下之前。

8. 成书于汉初、专人写成说

今人彭林持此说。彭氏《〈周礼〉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》对传统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，他为摆脱传统的注重考证的研究方法束缚，着眼于《周礼》思想体系的研究。他未从考证《周礼》中职官、制度、文字形态、语言风格入手，而从把握全书的思想体系出发，详细剖析了《周礼》的治民、治官、理财、阴阳五行思想及其国家政权模式，认为该书主体思想具有由儒、法、阴阳五行思想三家紧密融合“多元一体”的基本特征，吻合汉初追求思想多功能的时代需求，断定《周礼》当成书于汉初高祖和文帝之间，且出自一人之手，“成书的下限，当不得晚于文景之世，即道家思想尚未成为主流派之前”。

按，凭借一人之力，要对一个国家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礼制作全面系统的规划是困难的，同时《周礼》书中多有互相抵牾之处，出自一人之手的可能性不大。《周礼》表现的思想固然与汉初吻合，但其在实践中的表现与理论形成、思想源头与其盛行时间之间，有着漫长的发展过程。追溯其源头，汉初盛行的哲学思想，当在几百年前就早已存在。并且该书是由古文而非汉代隶书写成，故不太可能成书于汉代。此外，撇开传统的考证方法，单纯从书中的思想进行推论，也难以使人信服。

9. 成书于西汉末年、由刘歆伪造说

此说始倡于南宋胡宏，其直接目的是借此反对此前北宋王安石援《周礼》变法的观点。胡宏在《皇王大纪论·极论周礼》中认为，刘歆伪造《周礼》，是为“附会王莽，变乱旧章，残贼本宗，以趋荣利”，故“假托

《周官》之名，剿入私说，希合贼莽之所为耳”。南宋洪迈，清代万斯大，近人康有为、廖平、钱玄同，今人杜国庠等，均持此说。如万氏认为，《周礼》官制过于冗繁，赋税过于苛重，与先秦文献所载多有不合，当是后人伪作。康有为在《新学伪经考》中说：

至《周官》经六篇，则自西汉前未之见，《史记·儒林传》、《河间献王传》无之，其说与《公》、《穀》、《孟子》、《王制》、今文博士皆相反。莽《传》所谓“发得《周礼》以明因监”，故与莽所更法立制略同，盖刘歆所伪撰也。歆欲附成莽业而为此书，其伪群经乃以证《周官》者，故歆之伪学此书为首。

刘歆伪造《周礼》说在港台地区比较流行，如徐复观《周礼批判》、侯家驹《周礼思想渊源》等均从此说。徐复观在《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》中，分析了《周礼》一书的思想线索及其背景后，认为此书受到《管子》、《大戴礼记》、《淮南子》以及董仲舒、桑弘羊等人的思想影响，由王莽草创于前，刘歆整理于后，是表达他们政治理想之书。

按，此说不可信。早于刘歆的《大戴礼记·朝市》已记载《周礼》中“大宗伯”、“典命”、“典瑞”、“大行人”、“职方”等职文，刘歆不可能疏忽到有文献材料在前而后伪作的程度。况且《周礼》中有关礼仪的记载，也与当时流行的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多有不同。如若《周礼》系刘歆伪作，何以不弥合这些裂缝，而授人以柄？

要之，关于周礼成书年代与作者问题，聚讼纷纭，至今仍是学界讨论的重要话题。相信随着新材料的出现、学界对古书成书过程、作者概念等问题认识的加深，人们将会获得更为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。综合考量，当以“《周礼》成书于战国”说较为稳妥。

三、《周礼》的框架、内容与价值

《周礼》全书共6篇：《天官冢宰》、《地官司徒》、《春官宗伯》、《夏官司马》、《秋官司寇》、《冬官司空》。每篇各包括多个官职，每官之下都详

细记载其人数、职务等。其中《冬官》存目无文，汉人以《考工记》补入。《周礼》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。一些社会改革家和思想家从《周礼》中吸收了许多养料，以进行现实政治改革。

《周礼》的基本框架是政治制度、设官分职。通过各个官职具体职责的说明，显示一个相当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。上以神权观念为庇护，下以王权政治为主体，政治、经济、教育、风俗、军事等各个方面，无不在统一的“礼”之下行事。天子、诸侯、公卿、大夫、士，及至“万民”，均依据既定礼仪行事，从而形成上下相安、万民和谐的礼仪之邦，反映了儒家的主要思想倾向及其社会、政治理想。

《周礼》以记述职官职能来汇集当时的各类制度，是一部“设官分职”的国家机构设置、职责分工的法规总集。全书依据职能将政府机构分为六大部门，除冬官全部亡佚外，地官司禄，夏官军司马、舆司马、行司马、掌疆、司甲，秋官掌察、掌货贿、都则、都士、家士等职文也亡佚了。现存的五篇，每篇皆由叙文、叙官、职文三部分组成。叙文简叙该官设置之由，相当于总论，皆以“惟王建国，辨方正位，体国经野，设官分职，以为民极”数语冠其首。叙官列举该官所属之官府、爵位、人员编制并体现领属关系。六大官府各司其职，国有大事，如祭祀、宾客、丧荒、军旅、田役、敛弛，则六官各府协同办理，谓之“六联”。故《周礼》职文多由该官之专职、该官在大事协办中的地位和作用、该官的日常事务和例行事务等三部分组成。职文规定每一官员的具体职责。六大官府所属主要官府的官员设置和人员编制皆有定数，一曰正，总揽全局之正长；二曰师，正长之副；三曰司，掌一部门；四曰旅，掌一专项事务；五曰府，保管文件档案财物；六曰史，处理起草文书；七曰胥，十徒之长；八曰徒，行走传达。此谓之“八职”。各官府系列所属人数不一，天官 63 职，地官 78 职，春官 70 职，夏官 70 职，秋官 66 职，冬官（《考工记》）有工匠 30 职，共 377 职。有的职官有职官名而无职文，明确有职能记载的有 366 职。据孙诒让《周礼正义》统计，五官府可统计之供职人员为 57079 人，

估算加上冬官人数，王国境内政府机构供职人员当为六万以上，有爵者约占十分之一。

天官掌“邦治”，又谓之“治官”。地官掌“邦教”，又谓之“教官”。春官掌“邦礼”，又谓之“礼官”。夏官掌“邦政”，又谓之“政官”。秋官掌邦禁，以佐王刑邦国，又谓之“刑官”。冬官亡佚。汉人以《考工记》来弥补。《天官·小宰》中云：“六曰冬官，其属六十，掌邦事。”“六曰事职，以富邦国，以养万民，以生百物。”据此，历来认为冬官当为“司空”还是可信的。“司空”一职，唐虞时代已有。《尚书·舜典》云：“伯禹作司空。”《洪范》列“八政”也有“司空”。郑玄笺《诗经·大雅·绵》云：“司空，卿官也，掌管国邑。”颜师古注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云：“空，穴也。古人穴居，主穿土为穴以居人也。”可见“司空”原本掌管营建土穴，后泛指一切工程。而作为“司空”职官替代内容被补入《周礼》的《考工记》，则是另外一部主题集中而有特色的独立科技著作。

《考工记》是我国科学技术史上第一部杰作。其结构可分为两部分：开头为总论，论述百工的重要，提出“国有六职”，即，“坐而论道，谓之王公；作而行之，谓之士大夫；审曲、面斲，以飭五材，以辨民器，谓之百工；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，谓之商旅；飭力以长地财，谓之农夫；治丝麻以成之，谓之妇功”。其后记载轮人、舆人、辀人、筑人、冶人、桃人等当时官营手工业的三十种工匠之职，包括“凡攻木之工七，攻金之工六，攻皮之工五，设色之工五，刮摩之工五，搏埴之工二”，详细记载各种器物的名称、规格、工艺要求及制作过程。

《周礼》体大思精，结构缜密。六官职事复杂繁琐，但作者归纳概括成若干条原则。如天官系统太宰的职务，作者归纳为“六典”（明其统摄其他五官的地位）、“八法”（官员任用、考核、监察等官府治理原则）、“八则”（都鄙治理原则）、“八柄”（辅助君王运用生杀予夺权柄驾驭官吏）、“八统”（驾驭百姓）、“九职”（解决国民生计）、“九赋”（国家财政收入）、“九式”（国家财政支出）、“九贡”（广开财源）、“九两”（联络百姓）等。可

以看出,《周礼》全方位汇集了政治、法律、文化、教育、经济、军事、科技等各类典制,具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。

《周礼》保存了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宝贵资料。《周礼》记载的建国设官,是带有一定民主色彩的君主专制政体。《周礼》反映的政治制度,在我国封建社会中,影响极其深远。如全书对天、地、春、夏、秋、冬六官的设置,在后代基本付诸实施。隋代设置吏、礼、兵、度支(后改为户)、都官(后改为刑)和工六部;唐代在尚书省下,设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;宋因唐制;元仅改尚书省为中书省;明代废中书省,于是吏部又恢复了统辖地位;清因明制,清末六部才有所增改。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的中央官制,都与《周礼》六官框架有关联。历史上不少人在进行社会变革时,往往参照《周礼》。如王莽依据《周礼》改汉制;苏绰借鉴《周礼》改革官制;北宋王安石变法,亦自称取法《周礼》,反对派亦云“王安石以《周礼》乱天下”。

《周礼》保存了我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宝贵资料。《周礼》的理刑思想重在未犯罪前的纠治。其立足点是以教立国。《秋官·士师》的“五禁”(官禁、官禁、国禁、野禁、军禁)是为防患于未然。《周礼》对案情的审定十分审慎,订有三刺(讯群臣、群吏、万民,查明实情)、三宥(即宽恕因“不识”、“过失”、“遗忘”而杀人,区分有意行凶、误杀)、三赦(赦免幼弱、老耄和蠢愚)之法。对于万民之间的诉讼,《周礼》依据券书和契约决断。其刑法还体现出恤刑的意向。

《周礼》保存了我国古代文化制度与审美风尚的宝贵资料。《周礼》重视祭祀、卜筮。如《礼记·祭统》说:“礼有五经,莫重于祭。”负责礼制的春官首推大宗伯,所列五礼,祭礼(吉礼)居其首。祭祀对象为天神、人鬼、地祇三类。祭祀方式、祭品、祭器有种种不同。由此后世创造了灿烂的祭祀文化。《周礼》还崇尚乐舞,以之作为陶冶品性、祭祀鬼神、显示等级地位的手段。“大司乐”职以“乐德”、“乐语”、“乐舞”教国子,又明确提出以乐序尊卑,“王出入则令奏《王夏》;尸出入则令奏《肆夏》;

牲出入则令奏《昭夏》”。书中乐器种类、名称繁多，皆有助于考察古代文化风尚。

《周礼》保存了我国古代教育制度的宝贵资料。《周礼》对万民的教化，强调读政令和习礼乐。“大宰”、“大司徒”、“大司马”、“大司寇”分别以各自制订的治法、教法、政法、刑法于夏历十一月宣布于邦国都鄙，并于象魏悬挂，让万民观览。“小宰”、“小司徒”、“小司马”、“小司寇”又于第二年夏历正月再公布一次，并摇动木铎晓谕众官和百姓。习礼乐是对万民的行为、道德规范的熏陶和训练。“大司徒”的十二教，礼教占五条（祀礼、阳礼、阴礼、乐礼、仪辨）。作为乡学教学官法“乡三物”中的“六德”（知、仁、圣、义、忠、和）、“六行”（孝、友、睦、姻、任、恤）也都属于礼的范畴。《周礼》突出道德教育中音乐的感化作用。“大司乐”职掌教国学的教法、治王国的学政，它以“乐德”、“乐语”、“乐舞”教国子，强调乐语盛行，乐舞不衰，以达到处世和谐的目的。《周礼》的教育组织有国学（国家所设，培训贵族子弟）和乡学（地方学校，庶民可入学）等形式。

《周礼》保存了我国古代经济制度的宝贵资料。《天官·太宰》十条官法有四条（九职、九赋、九贡、九式）属于理财范围。《地官》七十八职，除六职掌有关教育事项和六职掌管祭祀外，其余全是执掌有关地政、人力、物产和流通的人员。《周礼》把均分耕地当作经济中的首要问题，“小司徒”一职把土地分成三等，按人口、劳力多少加以分配。《周礼》强调完善水利灌溉系统、选种和注意种植方法，改良土壤和按不同土质施肥，提高土地利用率，“大司徒”、“草人”、“司稼”、“遂人”、“稻人”等职中皆有记载。《周礼》对农民的负担和分配，采取均衡制。《地官》中“司稼”、“均人”、“载师”皆为掌均万民之食、均地守、均地职的官员。《周礼》对经贸工商采取抑制政策，并注意开源节流，重视财富积累与均节财用。通过加强户籍管理，精确统计人口，按人口和土地纳税，强化农民承担的九功、九赋、力征、军赋等多种义务。《周礼》的财经管理制度十分严密。《天官》“大府”、“玉府”、“内府”、“外府”、“司会”、“司书”、

“职内”、“职岁”、“职币”等九职则分掌治藏和会计，各有职司而互相牵制，形成一个严密的财经管理体系。

《周礼》保存了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宝贵资料。《考工记》充分体现了当时的工艺水平，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其中所列30个工种6类工匠，包括以“轮人”、“舆人”、“辀人”与“车人”等为代表的制车系统；由“金有六齐”统率，包括“筑氏”、“冶氏”、“桃氏”、“鬼氏”、“栗氏”与“段氏”等的铜器铸造系统；以“弓人”、“矢人”、“冶氏”、“桃氏”、“庐人”、“函人”与“鲍人”等为代表的弓矢兵器、制革护甲系统；以“梓人”、“玉人”、“鬼氏”、“鞀人”、“磬氏”、“画绩”、“钟氏”等为代表的礼乐饮射系统；以“匠人”为代表的建筑水利系统；以“陶人”、“瓶人”为代表的制陶系统等各类工艺技术系统，涉及造车、冶炼、制兵（武器）、治皮、施绘、装饰、雕刻、水利设施、测量、制陶等多种工艺，详细记载了各种工艺的原料、制作过程和制作原理，包含着物理学、生物学、天文学、数学及度量衡等多学科知识。无怪乎《考工记》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评价为“研究中国古代技术史的最重要的文献”。

《周礼》保存了我国古代文学的宝贵资料，可谓中国早期散文的经典之作。论者指出，《周礼》的文学思想，应包括神话、诗歌、散文思想及其文艺批评思想，具体包括《周礼》对于神话、诗歌、散文的制作者、读者、使用者和批评者的心理、审美趣味等方面的规范与影响；神话与《周礼》的互相关系，包括《周礼》对神话的利用和制约；《周礼》体系中的诗乐构成、适用情况、传播情况；《周礼》规范下的诗歌创作与编纂；《周礼》表现的各种礼乐制度对文章写作的需要，对行政文本、史传、铭文创作的影响等诸多方面。事实上，《周礼》的文学价值，还远不止于此。

《周礼》还保存了丰富的上古语言文字资料。从文字学方面看，该书经文保存了数十个古文字形，有些可以与出土铜器铭文、简帛等文献字形做对比研究。从词汇学角度看，即以汉代郑玄《周礼注》的复音词标准出发，《周礼》复音词一共有3359个，如果不计词性只计词形，则有

3331个。这些都是研究《周礼》时代古代汉语的宝贵语料。对于《周礼》日渐深入的语言文字的研究,必将有助于推进《周礼》成书时代、作者及该书整体思想内涵的研究。

要之,《周礼》汇集了早期国家体制种种典制与设想的宝贵资料,兼具儒家、法家及阴阳五行等思想,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史具有重要史料价值,可谓中国文化史上的无价之宝。

四、历代对《周礼》的研究

《周礼》体大思精,文繁事富。自刘歆校理《周礼》,并尊之为经以后,历代学者研究训释、考辨《周礼》的成果极为丰硕。据王锷《三礼研究论著提要》统计,汉代至1999年,历代学者研究《周礼》的专著已达551部,单篇论文已达457篇。训释文字以郑玄注、贾公彦疏《十三经注疏》本的《周礼注疏》和孙诒让的《周礼正义》为最精审。考辨性文字从汉代以来也有不少。乾隆十三年鄂尔泰等奉敕撰作的《周官义疏》可作参考。

西汉末期,杜子春师从刘歆研习《周礼》,并撰有《周官注》。东汉郑兴、郑众父子以及贾逵师徒从杜子春研读《周礼》,三人各自撰有《周官解诂》。东汉研究《周礼》的学者还有卫宏(《周官解诂》)、班固(《周礼班氏义》)、张衡(《周官训诂》,佚)、马融(《周官传》)、临硕(《周礼难》)、郑玄等人。马融《周官传》“欲省学者两读,故具载本文,后汉以来始就经为注”。东汉末年轻学大家郑玄的《周礼注》成就最显著。郑玄学问渊博,精于“三礼”,其注释功力极深,兼采今古文,“囊括大典,网罗众家”,广泛融会吸取杜子春、郑兴、郑众、卫宏、贾逵、马融等人的研究成果,广搜博稽,训释经文,阐述礼制,正读字音,纠正衍误,可谓是《周礼》学的第一次全面整理和总结,对“三礼”的定型起了重要作用。郑玄注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,著《三礼目录》,《周礼》跃居“三礼”之首。他还有《答临硕周礼难》、《周礼郑氏音》、《周礼序》,今各存辑佚本一卷。